

政治文化视域下的新疆屯垦历史变迁 与兵团人身份认同^{*}

邹 赞

提要:新疆屯垦戍边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高度计划管理体制形成了急剧张力,兵团人口结构的变迁导致兵团人的主体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兵团屯垦戍边认同的代际差异也致使新疆当代屯垦文化的主体性遭遇困境,兵团的特定历史境遇迫切要求建构一种适合外在情境变迁的文化认同,而借助于市场经济体制影响下的文化再现与当代文化生产,书写、重构有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屯垦戍边的历史记忆,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表意实践。兵团人的身份认同是构建多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重要力量,关系到边疆文化安全和国家的总体安全战略。

关键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屯垦戍边 政治文化 历史变迁 身份认同

作者邹赞,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副教授。(乌鲁木齐 830046)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15.04.01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在延续中国历代屯垦戍边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包容性、开放性、政治性”为显著特征的国家内部移民文化形态。一方面,兵团文化呈现为多民族、多宗教、跨地域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如果要消解文化冲突,建构起一种互为主体、平等对话的兵团文化认同,就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而应该在倡导“一体多元”文化格局的前提下,确立起以屯垦戍边精神为内核的主体文化,妥善处理好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主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兵团人的身份认同是构建多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重要力量,关系到边疆文化安全和国家的总体安全战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现存唯一集党政军企职能为一体的屯垦戍边社会组织,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建制。新疆屯垦戍边事业渊源于汉唐以来的西域屯田,有着绵延的历史印记。据史料记载,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屯田最早始于汉文帝年间,为巩固北部边防、抵御匈奴侵扰,政治家晁错上书汉文帝:“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敌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①晁错认识到“将士轮换”守边制度的不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从‘文化研究’视角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文化的变迁”(10YJ CZH255)。

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会编:《中国历代屯垦资料选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足,主张“募民实边”,以特赦和优惠政策从内地招募罪人、刑满免罪者、家奴、官奴以及自愿支边的农民,“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①这种重视对屯民进行军事训练、鼓励他们扎根边疆的理念显现出“寓兵于民、屯田戍边”的农战思想。到了汉宣帝年间,军事家赵充国三次呈献屯田良策,“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②赵充国所上奏疏的高明之处在于阐明了解决边疆地区民族矛盾的新思路,即要恩威并举,军事镇压和屯田戍边双管齐下。值得注意的是,赵充国历陈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兴办军屯的巨大益处,诸如“屯田得谷”、打击叛乱敌人并争取一般的少数民族群众、保护农桑、开源节流、弘扬国威等。^③如果说两汉屯田以军屯为主要形式,以巩固西北边防为政治目标;那么,曹魏的屯田之举则以民屯为主,垦荒屯田不是为了加强塞防,而是服务于“奖掖农耕、鼓励桑织”的内地发展战略。唐王朝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曾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瑰丽的精神财富,为了有效应对西北边疆突厥、吐蕃侵袭,唐王朝在西北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在天山南北大兴屯垦,促进了西域屯垦的大发展和历史进步”^④。唐王朝吸取了“屯田兴,边境宁;屯田废,边境乱”的历史教训,凭借中央政府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采取军屯和民屯相结合的形式,除了边防戍卒,还从内地大量招募破产农民以及流放西域的犯人。^⑤北宋时期多边患,辽和西夏虎视眈眈,时常劫掠边民,虽然有陈恕、钱若水、范仲淹等有识之士秉笔谏言、呈献屯田戍边之策,但终因朝廷腐败,无暇顾及边防屯戍而导致朝政覆灭。明代屯田兴盛,且形式多样,有民屯、谪屯、商屯、军屯诸种,^⑥为了确保长久戍边,明代统治者还挖空心思想安抚士兵、强化士兵与封建国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总是让军士在营,带家小随往,使之有‘系累’或‘系绊’”^⑦。清代是我国历代屯垦事业发展相当成熟的时期,中央王朝审时度势,认识到要抵御沙俄入侵、平定准噶尔叛乱,就必须在西北边疆大兴屯垦,除了沿袭汉唐以来的军屯模式外,清朝还特别重视发展民屯,“清代民屯的蓬勃发展,是清代新疆的较之前代的重要战略转变,改变了汉唐

以来新疆屯垦专为养兵的局面,从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发”^⑧。1875年,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围绕海防与塞防孰重孰轻展开了激烈论争,这一方面反映出晚清中国陷入列强觊觎的险恶政治局势,另一方面也再度印证了屯田戍边对于固边稳疆、定国安邦的重要意义。民国年间,我国西北边陲政权更替频繁,局势动荡,这一时期的新疆屯垦“两起两落,有过兴盛,也经历了衰退。屯垦事业艰难、曲折地发展着”^⑨。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坦诚争取和积极斡旋下,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伴随着新疆融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潮流,新疆屯垦事业也迎来新的机遇。应当说,当代新疆屯垦戍边的历史实践凝聚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屯垦思想智慧,科学吸收了历代屯垦经验和农战思想,是维护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王震率领的进疆部队汇同国民党“九·二五”起义官兵,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开展大生产运动和部队整编工作,“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减轻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和人民生活,稳定了新疆的局势,而且把那些复员转业回乡的内地军人,暂缓复员,留在新疆作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骨干力量,为新疆兵团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⑩。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告成立,十余万官兵就地转业,劳武结合、屯垦戍边,建成了一支“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永不转业”的生产队、战斗队和工作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兵团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业绩,迎来了当代屯垦戍边事业的黄金时代,兵团犹如一个大熔炉,融汇了解放军进疆部队、国民党九·二五起义官兵、西上天山的内地女兵、内地支边青年、流民遣犯以及自流来疆人员,也凝集了新疆世居民族和内地来疆的各族群众,成为多元文化交流对话的典型场域。尽管新疆兵团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遭遇重大挫折,甚至曾经一度被撤销,但自从八十年代初恢复建制以来,新疆兵团一直都是巩固西北边防、维护民族团结的前沿阵地,其所承担的政治使命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愈加重要。

①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会编:《中国历代屯垦资料选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0页。

③ 详论可参见李福生主编:《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上卷),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④⑤ 张安福、郭宇等:《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第15、42—52页。

⑥⑦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2009年,第1、255页。

⑧ 张安福:《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183页。

⑨ 赵予征:《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3页。

⑩ 李福生主编:《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上卷),第3页。

新疆兵团屯垦戍边继承了汉唐以来的西域屯田历史实践,虽然二者在屯垦目的、屯垦主体、组织形式乃至屯垦绩效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从国家政治层面和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说,历代屯垦实践对于当下兵团屯垦戍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屯垦戍边有利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确保丝绸之路畅通,加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与内地汉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草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中西亚文明与东亚文明之间的互通有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其次,屯垦戍边所带来的大规模、有组织的人口流动有利于增进民族融合,更新生产方式,进而强化国家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意识。费孝通先生详细爬梳中华文化的历史生成与源流谱系,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说法:“在这多元格局中,同时也在接触中出现了竞争机制,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①所谓“多元一体格局”,既指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在历史进程中的渗透融合,也意味着区域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比如楚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与西域文化间的对话。可以说,能否正确认识到中华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关系到当下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是建构和谐民族关系、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基础。再次,屯垦戍边不仅加强了人口迁移、经济交流,也极大地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文化发展。这种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互影响,广泛涉及宗教、文学创作、音乐歌舞、日常审美等,盛唐时的“文人出塞”热潮催生了以王之涣、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唐玄奘不畏艰难远赴西天取经,留下了广有影响的《大唐西域记》。佛经在中原的传播,影响了变文、俗讲等文学样式。西域歌舞、宗教绘画也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跨异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触及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由于民族融合给文人心理带来的巨大变化,从唐代开始,边塞诗人的心弦开始鸣奏出一种强音,即不再把边塞视为异域,把它和故乡对立起来,而是心甘情愿生活在边塞,甚至以那里为自己的归宿”^②。

综而论之,新疆兵团屯垦文化渊源于汉唐以来的西域屯田文化,这种文化在长久的传承和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它以内地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为母体,以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根本

宗旨,以前赴后继的屯垦军民为主要载体,吸收了新疆多民族文化以及内地移民文化,兼具爱国主义精神、开拓进取意识和多元共生态势。^③

二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织形态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发生变化。在50—70年代,兵团基本上是一个“劳武结合”的准军事化组织。文革之前,新疆兵团经历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文革十年,兵团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遭遇重大损失,并于1975年被撤销。1981年,党中央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建制。20世纪80年代,新疆兵团屯垦事业穿越历史的雾障,重新与兵团初创时期相串接,以军垦第一代为核心力量、以内地新移民为新鲜血液的屯垦文化获得了长足进展。在文学创作方面,以杨牧、周涛、章得益为代表的“新边塞诗”登临中国文坛,其中杨牧的诗歌《我是青年》和自传体小说《天狼星下》影响较大。西部第一家诗刊《绿风》也在“戈壁明珠”石河子安营扎寨,推出了著名诗人石河、杨眉、洋河、杨树、高炯浩等。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新疆兵团屯垦文化延续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内核,突显了理想主义和多元文化色彩。

20世纪90年代以降,市场化改革对兵团的高度计划经济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兵团人口主体构成的巨大变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兵团基层组织日趋松散化,年轻一代和新移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迷惘与动摇,屯垦戍边文化认同遭遇“代际断层”。

首先,兵团政企不分的计划管理模式极大地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兵团经济不仅落后于内地许多省市,甚至不及新疆一些地方州县,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观念相对滞后,兵团逐渐丧失了五、六十年代的吸引力。

其次,兵团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有组织的大规模内部移民使得兵团人口快速增长,70年代中后期,兵团被撤销建制,原本隶属兵团管辖的人员大量转移到地方。80年代初兵团恢复建制,人口格局相对稳定。90年代以来,兵团迎来了

^①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5页。

^② 张安福、郭宁等:《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第267页。

^③ 有关新疆兵团文化的特征,可参看高静文、张春霞的《兵团文化的特征及其当代价值》,载《新疆社科论坛》2010年第4期,王小平、安晓平的《论新疆屯垦文化的特征及其在新疆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载《塔里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第二波移民潮,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产业结构调整、市场投资、农业现代化等领域提供大量优惠政策,兵团的区域优势崭露头角;另一方面,随着军垦第一代^①退休(有的选择回内地或者南北疆各城镇居住)、部分军垦第二代选择定居城市或者改行经商,军垦第三代远赴内地求学谋职等,兵团劳动力供给严重匮乏。有数据显示,“兵团职工人数由1991年的101万人持续减少到2005年的66.54万人,十几年内兵团职工总人数减少了近一半。而从1990年到2005年兵团农场总播种面积从780.8千公顷增加到985.8千公顷。其中需要大量拾花劳动力的棉花播种面积从170千公顷增加到471.74千公顷,种植面积在不断增大而劳动力却持续的在减少”^②。因此,为了补充劳动力的巨大缺口、确保屯垦戍边事业持续发展,兵团再度从内地引进大量新移民,但是与五六十年代相比,“进入90年代以来新引进的劳工大多来自贫穷、边远、人多地少的地区,文盲和半文盲占较大的比例,综合素质偏低”^③。与此同时,兵团还大量从内地招募拾棉花的短期季节工,每年九月,一列列满载拾棉工的列车西出阳关,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④应当说,90年代以来的内地新移民为兵团经济建设和边疆社会稳定注入了新鲜活力,但他们主要以赢利为目标,流动性很大,对屯垦戍边的历史源流和现实战略意义疏于了解,很难形成自觉的兵团人身份认同。

最后,随着兵团农场卫星城镇建设和互联网的普及,加之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兴起的时代大背景,新疆兵团文化要想重塑影响力、适应新媒介的传播方式,就必须进行文化形态的更替。一方面,“军垦第三代”身处大众文化、大众传媒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语境,耳濡目染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以身体快感、时尚狂欢、娱乐至死为特征的当下流行文化消解深度模式,离析瓦解传统价值观念,质疑宏大叙事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样一来,“军垦第一代”铸剑为犁、“献了青春献子女”的伟大奉献精神在“军垦第三代”看来只是一种“神话”,一种远离现实情境的道德说教。与此同时,单纯依靠精英文化(比如屯垦文学)传播屯垦戍边精神的模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以影视为主导形式的大众文化成为弘扬兵团精神、建构新形势下屯垦戍边文化认同的

理想载体。近年来,《热血兵团》、《戈壁母亲》、《走天山的女人》、《烈日炎炎》等屯垦题材影视剧近年来形成集群效应,备受瞩目。屯垦题材成为影视剧挖掘的富矿,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充分把握时机,以大众文化的叙事模式、借助电影电视的传播媒介,将屯垦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其中,如何有效接合消费主义的历史情境、兵团的红色文化内核、以及受众的期待视野,成功地实现屯垦文化的现代转型,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与兵团高度计划管理体制形成了急剧的张力,兵团人口结构的变迁导致兵团人的主体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兵团屯垦戍边认同的代际差异也致使新疆当代屯垦文化的主体性遭遇困境。为了建构一种契合于时代变迁的自觉的兵团人身份认同意识,新疆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记忆在当代文化生产(文学、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口述史、博物馆等)中被持续性重构与书写,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图景里的重要一脉。因此,要详细考察新形势下兵团人身份认同的建构策略,就必须重返这些再现的文本,借助于文本细读与话语分析,发掘出那些蕴藏在文本深层的再现政治及其文化意义。

首先,应当以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两种在20世纪90年代兵团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类为对象,考察两种文类各自的演进脉络及其创作概貌,集中关注兵团小说与报告文学在表述对象、主题呈现等方面与50—7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及其80年代知青小说、改革文学的承继关系,凸显其对于“兵团代际形象”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屯垦生活的勾描,并从90年代的社会历史语境出发,结合创作者的文化身份、文本叙述技巧以及此时期的文学热点事件,分析本阶段兵团小说、报告文学对于屯垦戍边历史记忆的重构。

其次,以《热血兵团》、《戈壁母亲》等近年来颇具影响的屯垦题材影视剧为研究对象,将这些影视文本放置于文化怀旧、消费主义、重写红色经典的历史情境下,追溯屯垦题材影视剧在新疆军旅题材影视作品序

^① 本文对于军垦代际的划分,采取学界通行的模糊划分法,即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疆的这一批为“军垦第一代”,以这一时段出生并且在兵团长大、留在兵团服务的为“军垦第二代”,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军垦后代基本上划归为“军垦第三代”,但“军垦第三代”的命名本身很成问题,“军垦新生代”的提法可能更加合理。此外,笔者近两年来辗转天山南北、寻访军垦第一代,通过对数十位老军垦的访谈,发现“军垦第三代”对屯垦戍边的历史产生了很深的隔膜,他们甚至不愿意了解或者不相信爷爷这一辈的艰苦创业事迹。

^{②③} 刘月兰、汪学华:《1954—2005年新疆兵团人口发展特点及制约因素分析》,《西北人口》2008年第1期。

^④ 近年来,新疆兵团农场积极推广机械采棉,对内地季节采棉工的需求大幅减少。

列中的文类脉络,凸显文化生产机制的维度,比较分析兵团自我书写与外部投拍影视剧之间的关联互动,阐释这种互动对于兵团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影响。

再次,以《西部女人事情》、《八千湘女上天山》等口述史为研究对象,探析在口述史这种具有跨文类意义的历史叙述与历史文本中,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面对历史的大叙事,个人经验与个体记忆如何选择?叙述主体如何讲述?口述历史如何启动记忆/失忆机制,重构一种当下的历史叙述话语实践?通过对屯垦口述史的细读,探究这些文本生产的社会机制与文化认同的建构,在复活各种边缘的历史记忆的同时,直面与屯垦戍边历史相交织的性别政治与民族国家话语。

最后,以军垦博物馆、艾青诗歌馆、军垦第一连等屯垦历史的记忆符号为研究对象,详细考察博物馆作为一种被展览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何承载起“触媒”功能,唤起人们对于兵团初创期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通过重组历史记忆的片段,有效借助日常生活的仪式叙事,将个体记忆上升为特定时期的集体记忆,进而服务于新形势下兵团人身份认同的建构。

应当说,自美国学者 G. A. 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以来,该术语所指涉的意涵聚焦于政治体系的“软性”精神范畴,越来越频繁地用来描述某个特定社会组织的成员对该组织政治制度的情感及态度,侧重以文化分析和日常经验民族志参与的方式去发掘社会组织成员针对某种政治客体的“取向”,这种“取向”实际上就是一种现代公民的情感政治。以此为参照,新疆兵团屯垦戍边文化认同是构建兵团人身份认同的基本前提,也是兵团政治文化研究的核心环节,只有深入体验兵团人的日常生活、借助文化分析的阐释路径,发掘出当代文化生产对于屯垦戍边历史记忆再现,才能真正认识到当下兵团人对于兵团这一特殊政治组织形态的情感态度,才能更好地评估新疆兵团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置,进而为后冷战情境下西北边疆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战略提供坚实的屏障。

责任编辑:田明孝